

古籍辨伪献疑

张昌红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随着对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以及电子检索等现代学术手段的使用,许多“伪书”被证明其实并不伪。这就迫使我们古籍辨伪的概念、目的、方法、证据、论证过程以及成果应用等提出质疑,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古籍;辨伪;伪书;疑古派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167(2011)04-0179-03

如果说古籍辨伪在宋代以前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话,那么宋代以后则是它走向系统化、专门化的阶段。受宋代疑古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传世典籍中有伪书。古籍辨伪也由对个别书的个别内容的怀疑,逐渐发展成为对相当一部分书的整体否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一度成为显学。然而在辉煌的成绩背后,也有深刻的隐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屡有重大考古发现。随着对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以及电子检索等现代学术手段的使用,人们发现许多在之前已被考定的“伪书”其实并不伪。这就迫使我们以前的辨伪工作提出质疑。

1 概念是否统一

顾名思义,“古籍辨伪”就是辨别古籍的真伪,然而对于什么样的书才算伪书,各人理解却并不一样。胡应麟《四部正讹》列有二十种,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列十种,可见这个概念的外延相当复杂。这势必导致辨伪者对伪书的判断标准不尽统一,从而使古籍辨伪工作具有相当的主观性。既然辨伪者对伪书标准的理解不尽统一,那么在具体工作中出现结论不一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例如,张心澂《伪书通考》与邓瑞全、王冠英《中国伪书综考》均列《左传》、《史记》为伪书,而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却未列入。此外,读者对“伪书”概念的理解也不一致:要么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家的说法;要么是走向极端,对某书不是全部相信,就是一概摒弃。显然,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确定什么样的书才是伪书。如果说材料不真的就是伪书,那么书中有一两条假材料算伪书吗?徒弟们根据老师传授的知识写成书,又题上老师的名字,这算伪书吗?而在先秦古籍中,这种两难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很难用非此即彼,非真即伪的概念来涵盖。看来从理论上对古籍辨伪的概念进一步强化与限定是十分必要的,以使伪书与非伪书的界限更为分明。

2 目的是否明确

古籍辨伪的目的简言之就是还古籍以本来面目,为各类研究提供真实材料。然而纵观辨伪学史,情况并非如此。有些辨伪工作并不是为了求真,而是颇有私意。欧阳修为了维护圣人的形象,指出《周易·系辞》以下非孔子所作。原因仅仅是其文“繁衍丛脞”,不类圣人文章之“其言愈简,其义愈深”^{〔1〕}。乾嘉学者崔述在其《考信录·自叙》中说:“述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合于经者;百家所言,往往有与经相背者。于是历考其事,汇而编之。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删削之。”《考信录》虽非辨伪学专著,但对不合儒家思想的古籍皆斥为伪谬,其对古籍的辨伪带有明显的卫道性质。康有为出于变法和维护今文经学的需要撰写了《新学伪经考》,不仅把《左传》、《毛诗》、《周官》等古文经典清除出孔学庙堂,而且把当时官方哲学“程朱理学”也归入“伪学”,其目的是要挣脱传统儒家经学的束缚,打击顽固派“恪守古训”的思想。更有甚者,“专以破坏为目的,或以矜奇好异为目的,务求多发现伪书,以推翻破坏古人之说,或炫自己之能,如此则必多方周纳,以断其为伪”^{〔2〕}。古籍辨伪在很大程度上像法官判案,法官本人绝不能偏袒一方而指责另一方。对古籍辨伪来说,辨伪者断不能有先入之见。带有各种私意的辨伪行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更不用说其对古籍的考辨意见会有多少参考价值了。

3 方法是否得当

明代胡应麟在其《四部正讹》中提出“辨伪八法”。梁启超在其《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也总结了八种方法。相对于胡应麟的方法来说,梁启超的方法更具体,操作性也更强,影响也更大。但是现在看来,梁氏的这种具体方法

却并不怎么适合于古籍辨伪。古籍成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有时候单凭一两条证据就判定一部古籍为伪书，未免过于草率。余嘉锡在其《古书通例》一书中曾指出：“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3]瑞典学者高本汉也曾在其所著《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一书中对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提出的八种具体辨伪方法进行过批判，原因就是梁氏的方法过于武断，以一斑而盖全貌，这是辨伪失误者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点。其实，对于古籍辨伪来说，前人的辨伪方法只能拿来作原则性指导，没有哪一种方法是绝对的。真正的辨伪工作尚需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考证工作有一条“孤证难成断”的“潜规则”，古籍辨伪也不例外。

4 证据是否可靠

出现古籍辨伪失误多数是因为所据以得出结论的证据

观点	证据	出处
《孙子兵法》作者非孙武，乃春秋末战国初年山林处士所为	(一)“迁时已称十三篇，而刘歆、班固在其后，反著八十二篇”；(二)《左氏》无孙武；(三)《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四)“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五)“武自诡妇人可勒兵，然用百八十人为二队，是何阵法？” ^[4]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六)“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况在阖闾乎！”(七)“田齐、三晋即立为侯，臣乃称君为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 ^[5]	姚鼐《惜抱轩集·读孙子》
《孙子兵法》的实际作者是孙臆	“所讲战争规模比较大，还讲到用骑兵作战，很像战国时的战争情况。” ^[6] (同第六)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
	理由同以上第(四)、第(六)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孙武与孙臆为同一个人	(八)“《战国策》内孙臆的话与今本《孙子》相似”；(九)“《吕氏春秋》有‘孙臆贵势’，今本《孙子》有《贵势》篇。”	武内义雄《孙子十三篇之作者》及斋藤拙堂《孙子辨》 ^[8]
	(十)“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臆是其绰号。” (十一)“余读《孙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后天、地，此必庄周后乃知有此。……其人则自齐孙臆而误。” ^[9]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不可靠。以《孙子兵法》为例：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尉缭子》、《孙臆兵法》等残简，证明《孙子兵法》不伪，确为孙武所作，且与《孙臆兵法》不是一书。而学术界却长期认为《孙子兵法》是伪书。首发此议的是宋代的叶适，之后姚际恒、姚鼐、梁启超均附和之。姚鼐甚至又补充了两条证据。之后，冯友兰、任继愈及日人武内义雄、斋藤拙堂相继论证《孙子兵法》为伪书。上表是他们据以得出结论的主要证据。由于《孙子兵法》并非伪书已是既成事实，所以这里就不必再罗列批驳这些证据的有关材料了。

5 论证是否严密

古籍辨伪不外乎两种逻辑：一种是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认为古籍都是真的；另一种是先认定某书为伪书，再找证据证明自己的看法。而事实上鉴于古籍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古籍辨伪应以第一种逻辑为好。第二种逻辑容易发展为偏激，从而导致辨伪的失误。张之洞曾经说过“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10]，梁启超也曾说“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11]。而近代以顾颉刚、钱玄同为创始人的“疑古派”也怀疑传世典籍中有大量伪书存在。在此种逻辑下，辨伪者往往只顾寻找证据，而对证据的质量不甚措意。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张心澂《伪书通考》判定《尉缭子》为伪书，其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天官篇》效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二)“教人以杀”^[12]；(三)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四)文气不古。如果不是预先认定《尉缭子》为伪书，进而寻找证据，最后以此得出结论的话，真的不知道哪一条证据能站得住脚，能推出《尉缭子》就是伪书。更有甚者，《古今伪书考》居然把“教人以杀”也列为证据之一。难道学术界还有人不知道《尉缭子》是部兵书吗？

6 决断是否谨慎

古籍辨伪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要求辨伪者具有较全面的古典文献知识，并对文献的聚散有深入的了解，不然所得结论很容易失之公允。流传至今的古籍非常有限，而辨伪工作又要在有限的古籍中寻找有限的证据，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证据可谓少之又少。今天我们在证据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轻易判定一部历经千年的古书的真伪呢？很多时候考证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发现传统说法是正确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要不是甲骨卜辞的发现，恐怕还在遭受怀疑呢。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虽然罗列了128条证据（实有99条），但我们以此就认定《古文尚书》是部伪书的话，结论仍显武断。因为亦有不少学者举出大量证据以证《古文尚书》不伪。下表

列毛奇龄对《尚书古文疏证》中所举朱熹观点的反驳，可见一斑（引自四库本《古文尚书冤词》卷三）。

朱熹观点	毛奇龄反驳
“孔书自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之见，可疑之甚。”	古文始出孔壁，在民间不绝于传；诸儒不见系未立学官，传本甚少。
“《书》凡易读者皆古文，难读者皆今文。”	“书体无难易之分，惟典谟浑穆、颂命庞和、训诰通皙、誓诫峻激，每以体制分平险。盖庙堂之上高文典册，自与示师告众者不同。故有谓《盘庚》、《大诰》义直意曲，……且亦时代升降实使之然。”
“记录之实语难工，润色之雅词易好。”（一作蔡沈语）	“《汉志》：‘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简若干字，脱若干字。’《书序》‘其余错乱靡灭，弗复可知。’《论语》《孝经》与《书》同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论语》不讹损，世未尝疑。何独至《书》而疑之？”
“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	“《书》二十九篇乃偶得之数，非有意记忆；《尧典》、《皋谟》并非难读；二十九篇有文本，不必记，不然焉知其为科斗古文？”
“《书》凡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夫伏生口授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也？”	“《尚书》孔安国序非西汉文章，先汉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极轻，是魏晋间人作。”
“小序决非孔门之旧，伏生时无此文，且其文甚弱，亦不是先汉文字，只似后汉未人。”	《史记》中多次原文引小序文字，一字不差，小序也不伪。

7 利用是否合理

如果辨伪成果得不到合理利用，那么辨伪工作等于白做。辨伪成果就是指出何书为伪书。伪书有全伪、部分伪之分，而且后者的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如何充分利用伪书，使伪书发挥应有的价值，其重要性不亚于辨伪工作本身。事实上很多时候某古籍一旦被扣上“伪书”的帽子，人们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是“敬而远之”。仍以《尚书》为例，朱熹遍注群经，唯不注《尚书》，原因就是怀疑当时流行的《尚书》是伪书。受朱熹影响，蔡沈《书集传》将

今、古文分开注释，且“杂为之说”，以彰显其为伪作。更有甚者，吴澄《书纂言》只收今文28篇，而将25篇古文直接删去，以示毁黜之意。毛奇龄在《古文尚书冤词》中说：“开国以来，其攻之者遍天下，无论知不知，公然著书以行世，且有踵明代梅鷟谩骂古文之效。”^[13]其实，伪书和伪书的价值是两回事。经过认真辨伪之后，一部伪书也就具有了资料价值，关键看如何利用。对伪书的利用绝不能和作伪目的联系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做伪书者的险恶用心而对已经辨明的伪书嗤之以鼻。任何一种先秦古籍能够跨越千年时空流传到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易童子问 [M] // 欧阳修全集.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120.
- [2] 张心澂. 伪书通考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9年版. 1954: 6.
- [3] 余嘉锡. 古书通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9.
- [4]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 [M]. 排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75.
- [5] 姚鼐. 惜抱轩全集 [M]. 北京: 国学整理社出版, 世界书局印行, 1936: 54.
- [6]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简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140.
-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M]. 第1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86.
- [8] 武内义雄. 孙子十三篇之作者 [M] // 先秦经籍考. 中册. 江侠庵, 编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377—381.
- [9]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2—13.
- [10] 张之洞. 轺轩语 [M] // 张之洞全集. 第十二册. 苑书义, 孙华峰, 李秉新.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9796.
- [11] 梁启超.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
- [12] 姚际恒. 古今伪书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0.
- [13] 毛奇龄. 古文尚书冤词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爱新觉罗·永瑤, 等.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66—547.

The Suggestions about the Ancient Books BianWei

ZHANG Chang-hong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i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study of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the using of electronic retrieval and other modern academic methods, many "fake books" was proof actually not false. This will force us to put forward queries to the concept, goal, method, evidence, reasoning and application of achievements of ancient books BianWei, and introspect deeply to the existent problems.

Keywords: ancient books; bianwei; fake books; yigu school of thought

〔作者简介〕张昌红（1973—），男，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收稿日期〕2011—04—06